

# 文献保护 专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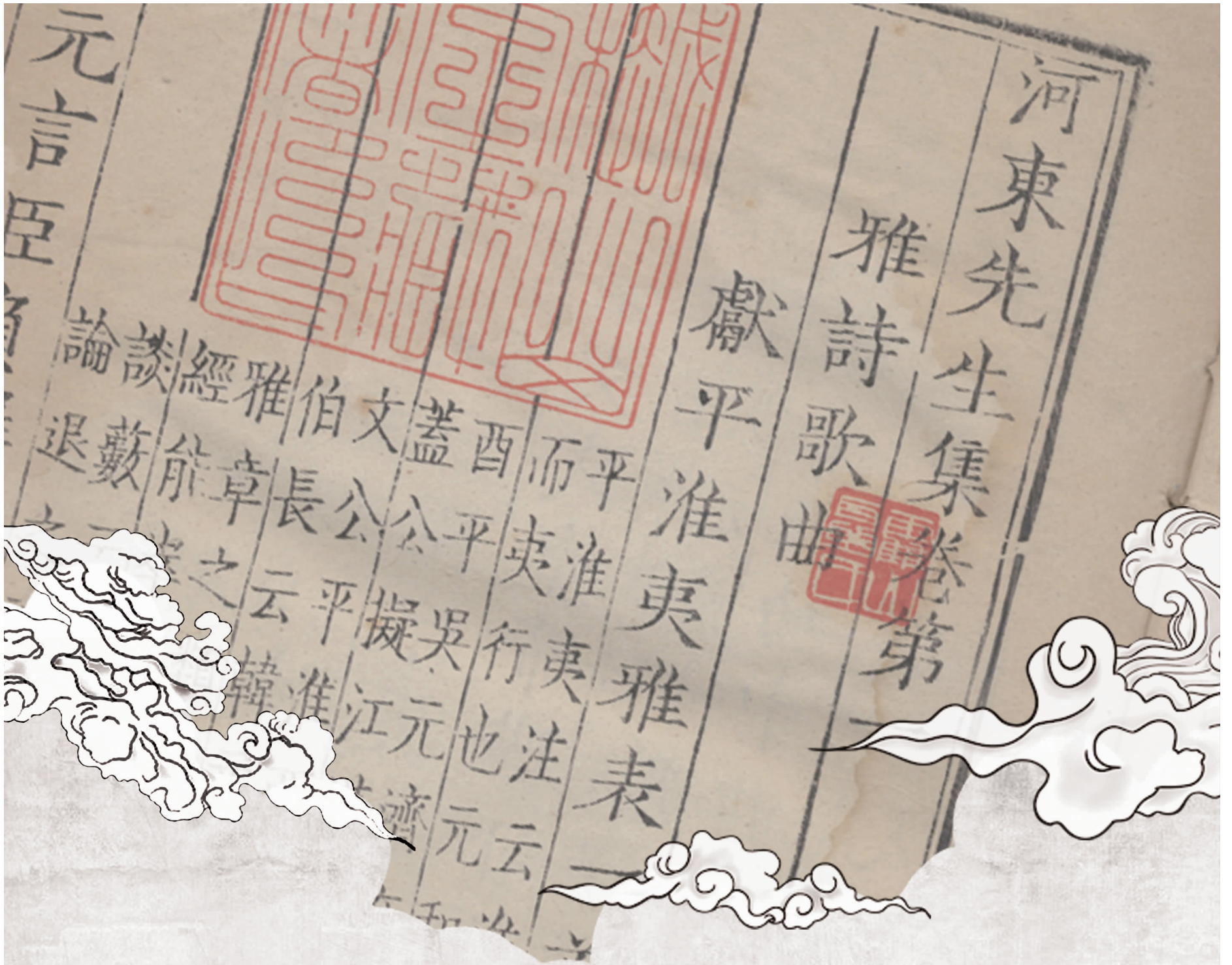
Document Protection Issue

主办：国家图书馆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图书馆报

2019年11月08日

第7期



## 10 业界动态

《中华善本百部经典再造》藏书文化展举行

## 11 馆长访谈

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馆长韦江谈地方古籍保护

## 12 图书推荐

《群书治要》《影宋本尚书正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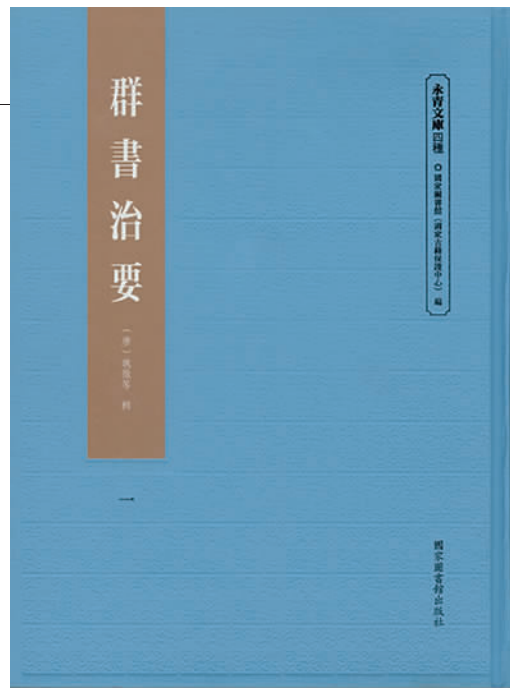
## 13-15 镇馆之宝

湖南图书馆、黑龙江省图书馆、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石家庄市图书馆馆藏珍贵古籍展示

## 16 古籍史话

承先启后的江瀚《京师图书馆善本简书目》





群书治要(全五册)

编著者:(唐)魏征等辑  
定价:1400.00元  
ISBN:978-7-5013-671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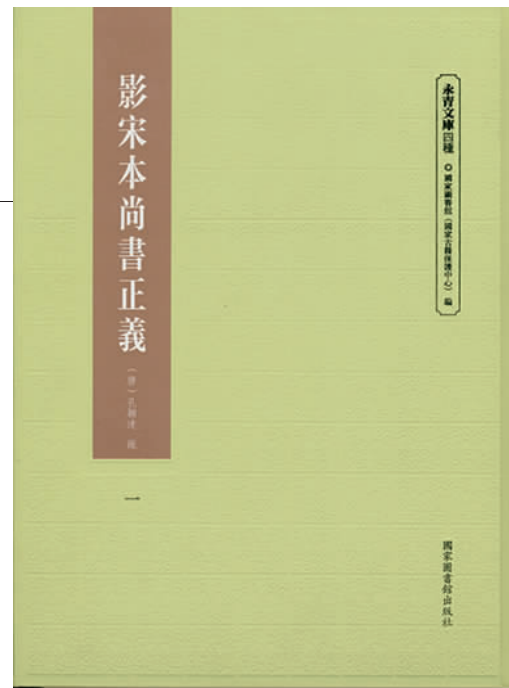
出版时间:2019年6月  
装帧:精装  
开本:大16开

内容提要

《群书治要》是唐贞观五年(631)由魏徵等人奉敕编纂之书,摘录了六十余种唐前古书,编次五十卷,内容主要为治国要领,因而起名《群书治要》。《群书治要》早期囿于禁中,手抄传播,流布不广,至宋时已佚。所幸此书经由日本遣唐使带到日本,成为学习研讨中华文化的一部重要经典,被日本历代天皇及大臣奉为圭臬。平安时代,日本皇室将它作为帝王教育的必读书,形成系统阅读该书的传统。江户时期,《群书治要》从皇室贵族抄阅,逐渐成为学者研究的重要书籍。宽政八年(1796),日本学者近藤守重将三部《群书治要》委托商船带回中国,是书遂为清朝学者所知。《群书治要》的流通互传是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见证。此次影印日本天明七年(1787)刻本,为国家图书馆藏永青文库选印四种之一。

作者简介

魏徵(580-643)字玄成,唐魏郡内黄(今属河南)人,祖籍钜鹿曲城(今河北晋州),一说馆陶(今属河北)人。少孤贫,出家为道士,后随李密等隋末农民起义军降唐,为太子建成洗马。玄武门之变后,渐得李世民信任,引为詹士主簿,官至谏议大夫、秘书监。以直言敢谏闻名当世,前后陈谏二百余事,为太宗敬畏。卒谥“文贞”。



影宋本尚书正义(全三册)

编著者:(唐)孔颖达疏  
定价:840.00元  
ISBN:978-7-5013-6715-3

出版时间:2019年6月  
装帧:精装  
开本:大16开

内容提要

《尚书》是关于中国上古历史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西汉初存二十八篇,相传由伏生口授,用汉时通行文字隶书抄写,是为《今文尚书》。自汉以来,为《尚书》作注疏者便层出不穷。唐贞观初年,孔颖达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等人奉敕撰《尚书》义训百余篇,称为“义赞”,太宗诏改为《正义》,是为《五经正义》之一。《尚书正义》搜罗宏富,考订详赡,保存了原已散失的汉代今文28篇,是研究古史的珍贵资料。日本对《尚书》的注疏一直多有收藏及传抄、刊刻。宋刊八行本《尚书正义》在中国曾失传,日本则存有两部。其中一部宋刻本收藏于日本足利学校。日本弘化四年(1847)熊本藩时习馆影刻足利学校藏宋本,使其广为流传,有功学界。此次影印日本弘化四年(1847)影宋刻本,为国家图书馆藏永青文库选印四种之一。

作者简介

孔颖达(574-648)字冲远。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少从刘焯同学。隋大业初选为“明经”高第,授河内郡博士。入唐历任国子博士、国子司业、国子祭酒等职。长于经学,尤精《易》《书》《毛诗》《礼记》《左氏春秋》。贞观中,受命领衔编撰《五经疏义》,也称为《五经正义》。孔氏整理《五经》,对南北朝经学家的见解均取其能切中经义者,故书成之后由政府颁行,成为经书定本。

“永青文库四种”出版说明

201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6月26日,日本前首相、日本公益财团法人永青文库理事长细川护熙先生将36部4175册汉籍无偿捐赠中国国家图书馆,延续了历史上“以书会友”的友好交流传统,为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该批捐赠多为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从儒家到诸子,从历史到文学,类型多样,保存完整,中日刻本俱在,是中日文化交往的重要例证。为纪念这次捐赠,国图特举办“书卷为媒 友谊长青——日本永青文库捐赠汉籍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展”,以中日两国纵贯千年、源远流长的书籍之路为

主线,展示此批汉籍捐赠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意义。国图还在善本书库内设永青文库捐赠汉籍专藏,向读者提供原件阅览服务;启动了捐赠汉籍数字化工作,秉承“边建设,边服务”的原则,陆续面向公众提供数字影像查阅服务。作为纪念活动的组成部分,国图从捐赠汉籍中,遴选出四部代表性文献,委托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以期满足广大读者阅读和研究之用。经部选用日本弘化四年(1847)影宋刻本《尚书正义》。该书宋刻在中国失传,幸由日本熊本藩时习馆影刻得以流传于世,是日本刊本中的名品。

史部选用日本明治十六年(1883)东京山中市兵卫刻本《点注十八史略》。德川幕府时期,日本讲习《十八史略》兴盛,诸藩官学多据为童蒙之书,对日本社会文化影响广泛。子部选用日本天明七年(1787)刻本《群书治要》。此书为魏征主持编纂,用史事资政。该书经由日本遣唐使带到日本,被日本历代天皇及大臣奉为圭臬。由于该书在我国唐末时即已亡佚,直至九百年后的日本宽政八年(1796)才重为清代士人所知。中国改革开放后,习仲勋同志曾为《群书治要考译》一书题词“古镜今鉴”,明确此书的警世育人价值。《群书治要》的刊印,

是中日文化交流千年的历史见证。集部选用清刻朱墨套印本《御制圆明园诗》。这部汉籍原为清代宫廷画师为乾隆皇帝《圆明园诗》所作,每景一图一诗,反映圆明园全盛时期景象,印制精美,在我国存世稀少,借此契机得以推广。细川护熙先生为这次汉籍捐赠,曾经墨书题写“文章经国大业不朽盛事”,以宣明文化典籍的重要功用。中日两国自古以来就是舟楫往还、文化互鉴的邻邦。这次精心甄选影印的四种汉籍,将继续谱写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佳话,希望能得到中日两国人民的喜爱。

湖南图书馆馆藏珍贵古籍之  
《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篋印陀罗尼经》  
(宋开宝八年吴越国王钱俶刻本)

最初,文献以缮写的方式产生,每抄写一遍,只能产生一册,事倍而功半。因此在印刷术发明之前,文献的数量极少,只有少数有钱、有闲阶层才能拥有一册或一部图书。雕版印刷术运用之后,这种状况才得以彻底改变。

雕版印刷是先将文字反刻在木板上,再板上刷墨、铺纸印刷的一种方式。每块雕版雕刻完成后,可一次刷印数百页乃至上千页,图书的产生因此变得简易,图书不再是贵族、士族阶层的奢侈品,知识从此开始向平民阶层流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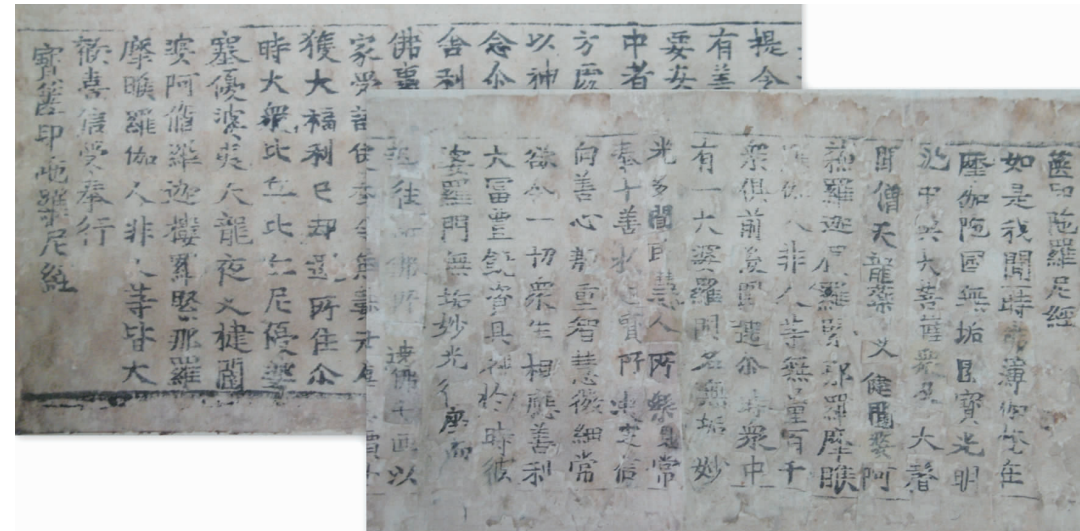
中国的雕版印刷术产生于隋唐之际,完善定型于宋。目前存世的中国宋元雕版印刷品不足两千件,且多为残本及复本。因此,宋元刻本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和文物价值,各图书馆及私人藏书家皆以拥有一部宋元刻本为傲。

湖南图书馆藏有宋元刻本30余部500余册,其中年代最早的对为北宋开宝八年(975)吴越国

王钱俶刻《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篋印陀罗尼经》,因其来源于西湖湖畔雷峰塔,故又称雷峰塔经。

雷峰塔,又名黄妃塔,原为五代时吴越国王钱弘俶为其妃祈福所建。后因一段“白蛇传”而受到人们的憎恶,在感慨白素贞对爱情坚贞执着的同时,人们也在责备着法海和尚的多事。1924年,雷峰塔终于在经历了千年的风雨飘零后轰然倒塌。鲁迅先生为此特作《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来表达人们无比欢欣的心情。蜂拥而来的人们在废墟中并未找到被镇压的白娘子,却在一些塔砖侧面的小孔里发现了一卷小小的经卷。大多数经卷被心情沮丧、讹以为塔中有“金砖”的民众践踏成泥,只有少数幸存下来。

钱弘俶为吴越国最后一位国王,面对北宋政权的咄咄逼人,钱弘俶审时度势,决定称臣入贡,并为避宋帝讳而耻辱地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钱俶”。开宝七



年(974),宋太祖赵匡胤平江南,钱俶出兵策应,被授天下兵马大元帅,仍称吴越国王。然而所有的一切,都不能使吴越国苟延残喘。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钱俶入朝被扣,不得已,举所据两浙十三州之地归宋,国灭。

此经卷卷端题“天下兵马大

元帅吴越国王钱俶造此经八万四千卷,舍人西关砖塔,永充供养。乙亥八月日记”。后为一幅小巧的“文殊菩萨讲经图”,再后为经文。“乙亥”为北宋开宝八年(975),此时距赵匡胤黄袍加身仅十五年,尚未真正统一全国。

目前存世的宋代雕版印刷

品多为南宋时所刻,湖南图书馆所藏北宋初年刻《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篋印陀罗尼经》对我们了解北宋初期政治概况及中国古代印刷术的发展、古籍装帧形式的变化,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供稿:湖南图书馆馆长贺美华)

黑龙江省图书馆  
纸韵书香,馆藏撷珍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漫长的岁月中,中华民族积累了丰富多彩、弥足珍贵的文化宝藏。古籍文献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对其传承、保护均给予高度重视。

黑龙江省图书馆经过数代古籍工作者的辛勤访求、不断积累,形成门类齐全,明清版本为主、特色鲜明的古籍馆藏。珍稀文献有唐写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黎庶昌跋元统二年梅溪书院刻本《韵府群玉》、“天禄琳琅”旧藏宋刻元明递修本《国朝诸臣奏议》等。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

黑龙江省图书馆存《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三百六十三卷,唐写本,卷轴装,装裱成长卷,全长924厘米,高23.8厘米,硬黄纸,凡十六纸,一纸长58.3厘米,每纸三十行,行十七字,共四百七十三行,乌丝栏,原经卷首题“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三百六十三卷 赞”,卷末题字“虞山邵氏兰雪斋收藏”。另外钤“长宜子孙”(朱文)及“松年所藏”(白文)印,在邵松年题跋中钤有“邵氏伯子”(朱文)、“松年伯英”(白文)、“松年所藏”(白文)、“邵福瀛印”(白文),共六方印。

此件经卷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由著名收藏家杨守敬从日本购回,又经清代工于书法和收藏的邵松年及

其子递藏,足见此经卷的珍贵,可谓玄圃积玉,淘足宝也。

《韵府群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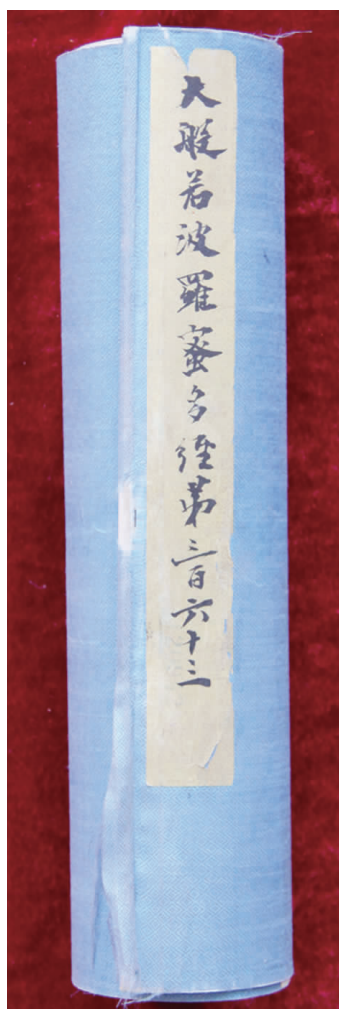
黑龙江省图书馆存《韵府群玉》二十卷,二十册。元代阴时夫撰,阴中夫注,元统二年(1334)梅溪书院刻本。该书匡高21.3厘米,宽12.8厘米。半叶十行,小字双行,行二十九字,四周双边,黑口,单鱼尾,目录后有“元统甲戌春梅溪书院刊”牌记。前有封面,刊有梅溪书院刻书广告之语,为他本所不存,最为珍贵,可见此书曾流入东瀛,经日本著名版本学家、《经籍访古志》之作者森立之收藏。黑龙江省馆藏此书乃传

世最早版本,是全省首批被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三种古籍之一,也是全省唯一入选2008年全国古籍特展的展品。

《国朝诸臣奏议》

《国朝诸臣奏议》,宋赵汝愚辑,宋淳佑十年(1250)温州刻元明递修本,一册,匡高21.4厘米,匡广16.5厘米。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三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双黑鱼尾,左右双边。原书共一百五十卷,馆藏卷六十一至六十二。

该书递经倪璣、袁忠彻、陆完、朱大韶等名家珍藏,后被“天禄琳琅”收藏。“天禄琳琅”为清皇家藏书处,藏品均为清宫藏书的精华部分,编有《天禄琳琅书目》。该书入选《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 汇聚馆藏精粹 传扬民族文化

## 广西图书馆馆藏珍品展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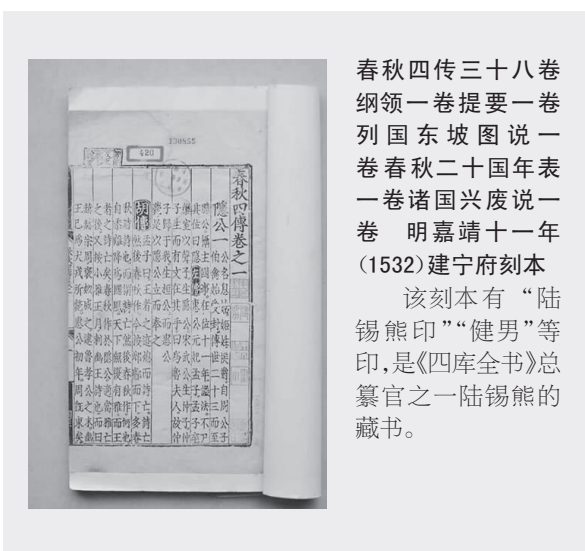
早在西汉时期,广西壮族自治区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中外文化在这里交流碰撞,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历史人文传统。广西现今留存的古籍,是历史的见证,更是各民族文化交融的结晶。广西图书馆是国家和自治区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其前身为创建于1931年的广西省立第二图书馆。历经80余载春秋,在一代代馆员的不懈努力下,构建了特色鲜明的馆藏体系,其中8万余种地方文献和11万余册古籍为广西图书馆馆藏精华。截至2018年,广西图书馆共有21部汉文古籍先后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是广西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最多的汉文古籍收藏机构。

广西图书馆馆藏汉文古籍涵盖经、史、子、集等各类内容。其中清康熙年间编印的《陇州志》八卷首一卷、《海丰县志》等都是当地存世最早的方志。馆内佛教古籍的收藏颇具特点,明刻《妙法莲华经》、明天启刻《楞严经疏证广解》均刊刻较早。明万历至清乾隆间刊刻的《径山藏》所收录的经书中,不少品种稀有,尤为珍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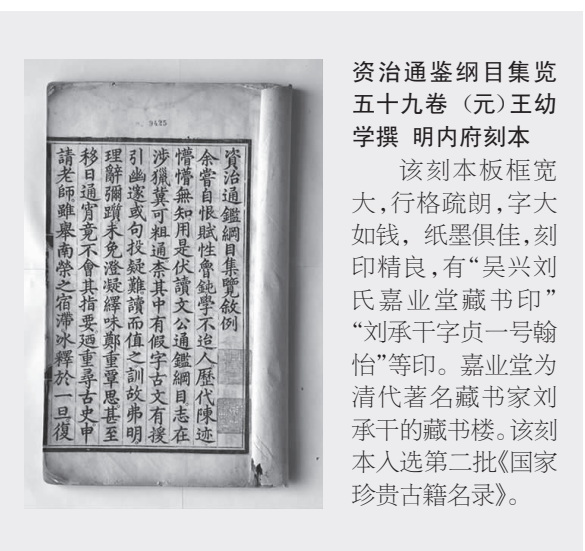
地方学者的藏书、著述是广西图书馆的特色专藏。收藏有明清时期祖籍或客籍广西的人士著述,如王鹏运、龙启瑞、陈弘谋、郑献甫、张鹏展、蒋冕、封祝唐、苏时学、钟毓奇等。这些地方名人著述与地方史志典籍较为系统地反映了明清以来广西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

作为以壮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区,广西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古壮字古籍则是广西民族文化和区域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馆藏古壮字古籍中有3部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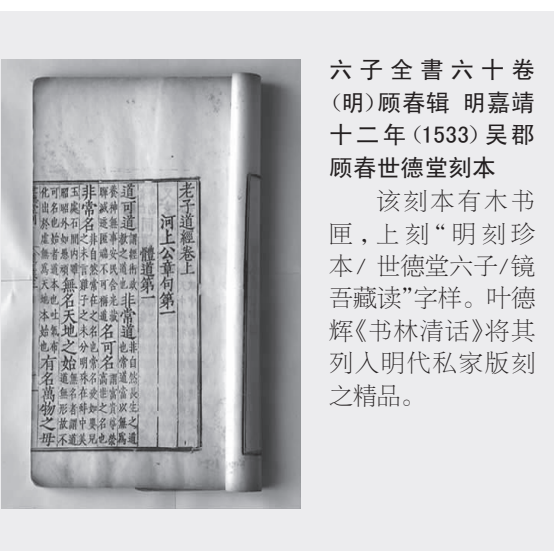
这些珍贵馆藏见证了广西历史、民族文化,为地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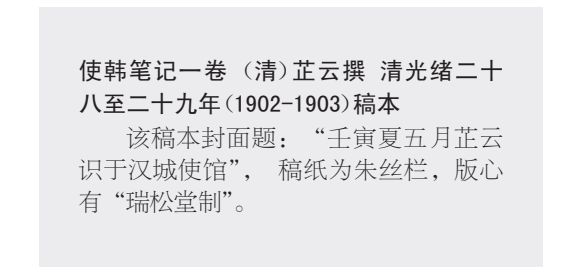
春秋四传三十八卷 纲领一卷提要一卷 列国东坡图说一卷 春秋二十年表一卷 诸国兴废说一卷 明嘉靖十一年(1532)建宁府刻本 该刻本有“陆锡熊印”“健男”等印,是《四库全书》总纂官之一陆锡熊的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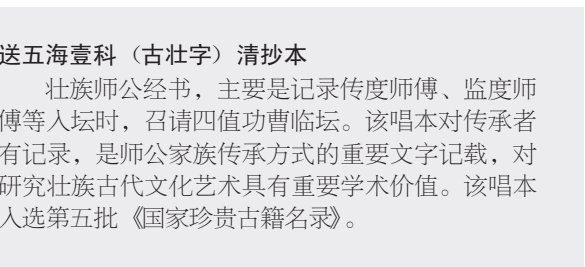
资治通鉴纲目集览五十九卷(元)王幼学撰 明内府刻本 该刻本板框宽大,行格疏朗,字大如钱,纸墨俱佳,刻印精良,有“吴兴刘氏嘉业堂藏书印”“刘承干字贞一号翰怡”等印。嘉业堂为清代著名藏书家刘承干的藏书楼。该刻本入选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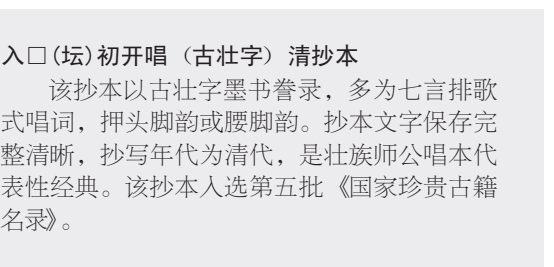
六子全書六十卷(明)顾春辑 明嘉靖十二年(1533)吴郡顾春世德堂刻本 该刻本有木书匣,上刻“明刻珍本”/世德堂六子/镜吾藏读”字样。叶德辉《书林清话》将其列入明代私家版刻之精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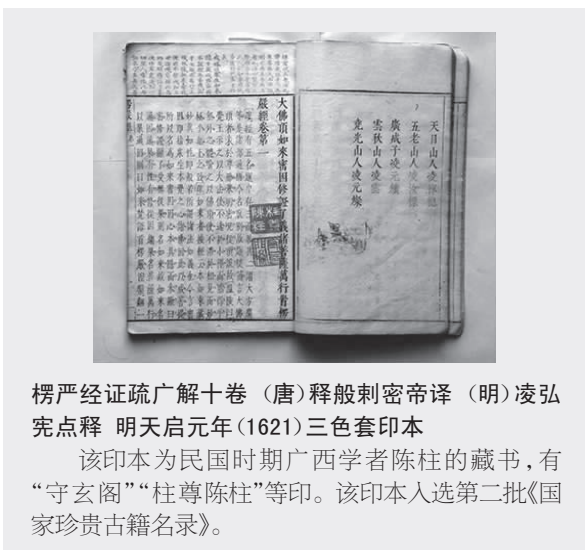
使韩笔记一卷(清)芷芸撰 清光绪二十八至二十九年(1902-1903)稿本 该稿本封面题:“壬寅夏五月芷云识于汉城使馆”,稿纸为朱丝栏,版心有“瑞松堂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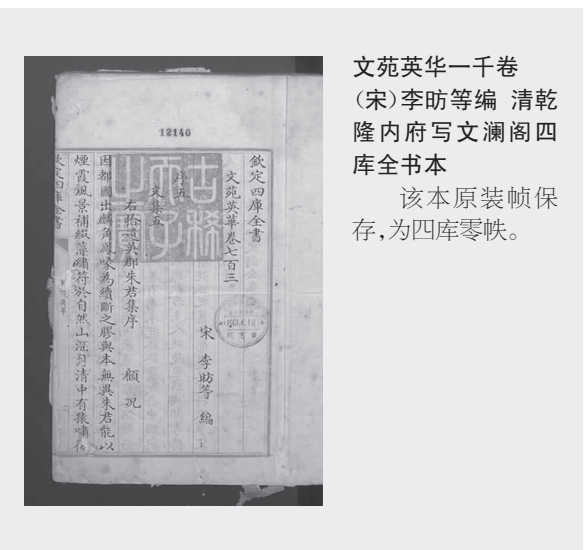
送五海壹科(古壮字)清抄本 壮族师公经书,主要是记录传度师傅、监度师傅等人坛时,召请四值功曹临坛。该唱本对传承者有记录,是师公家族传承方式的重要文字记载,对研究壮族古代文化艺术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该唱本入选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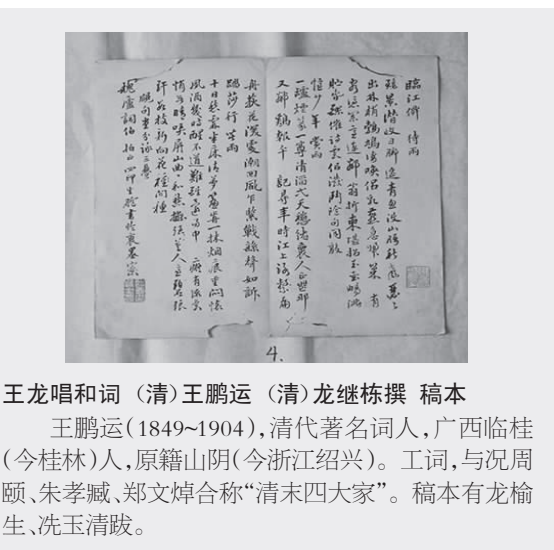
入口(坛)初开唱(古壮字)清抄本 该抄本以古壮字墨书眷录,多为七言排歌式唱词,押头脚韵或腰脚韵。抄本文字保存完整清晰,抄写年代为清代,是壮族师公唱本代表性经典。该抄本入选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楞严经疏证广解十卷(唐)释般刺密帝译(明)凌弘宪点释 明天启元年(1621)三色套印本 该印本为民国时期广西学者陈柱的藏书,有“守玄阁”“柱尊陈柱”等印。该印本入选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文苑英华一千卷(宋)李昉等编 清乾隆内府写文澜阁四库全书本 该本原装幀保存,为四库零帙。



王龙唱和词(清)王鹏运(清)龙继栋撰 稿本 王鹏运(1849-1904),清代著名词人,广西临桂(今桂林)人,原籍山阴(今浙江绍兴)。工词,与况周颐、朱孝臧、郑文焯合称“清末四大家”。稿本有龙榆生、冼玉清跋。

# 石家庄市图书馆珍贵古籍选介 选善编目 弘扬文化

□靳伯云 李锡凤

石家庄市图书馆现存古籍16万册(包括民国线装书及古籍影印本),这些藏书的来源,可追溯至石家庄解放初期。1947年石家庄解放,冀南军区图书馆、晋冀鲁豫边区图书馆(后改为华北政府图书馆)等解放区图书馆(室)调进一批古籍,这批古籍是解放区文化工作者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从社会上收集起来的,其中不乏珍善之本。因为当时我市尚未建立图书馆,这批古籍暂存于石家庄文化图书馆室。1958年7月1日,石家庄市图书馆正式成立,这批古籍移交我馆,为我馆开设古籍部打下了典藏基础。之后,又从

社会上陆续收集一些流散的古籍,最终使古籍典藏量达到了今天的16万册。由于当时多方面的原因和条件所限,这批古籍一直没有进行全面的清理。直到七十年代初期,国务院成立了古籍整理小组,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古籍普查选善工作。我馆也着手对古籍进行全面的整理、编目、选善,由馆副馆长、研究馆员刘家珍先生总揽其事,并从社会上聘请了一批学识渊博的文史工作者参与古籍版本的鉴定、选善工作。在这期间,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成员、古籍版本专家冀淑英先生、丁俞先生等都曾先后亲临我馆指导工作。经过几年的努力,我馆选送了

一批古籍,经审定有34种640册编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代表书目有我馆独家收藏的明弘治四年罗氏竹坪书堂刻本《周易传义大全》二十四卷、明万历刻本《涅中赋》七卷附《家食稿》一卷、明天启五年三山林周鸣岐笺新斋刻本《易经讲意纲目集注》四卷、明末金陵光启堂刻三色套印本《新刻顾麟初先生批点四书大文》五卷、明万历刻本《学林就正》四卷、《新刻三苏论策选粹》八卷等。此外,藏有省级古籍善本600余种,近万册,独家收藏有《(康熙)邢台县志》和抄本《(蓝山)县志》等。选善之后,我馆有了较为固定的古籍整理编目人员,初步建立了古籍卡片式目录。

2006年,在图书馆改扩建时,充分考虑古籍的藏书规模、古籍的保护与利用等方面的情况,参照国家文化行业标准中有关古籍库房环境及管理的要求,对古籍特藏库房给予了重点考虑和设计。现古籍特藏库设在新建楼5楼,面积达530平方米。特藏库中安装了独立的恒温恒湿空调系统、火灾和110自动报警系统、自动灭火系统、漏水检测系统、温湿度记录仪、空气净化装置、防紫外线窗帘等。2010年,将全部古籍移入樟木书橱。现有的古籍书库环境、条件基本达到了恒温、恒湿、防尘、防光、防老化的效果,对古籍存放起到了保护作用。2010年5月,我馆被国务院命名为第三批

“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2012~2015年,我馆对1911年以前的馆藏古籍进行了普查登记,并编纂了《石家庄市图书馆古籍登记目录》,2018年5月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发行。在进行古籍普查登记工作的同时,还开展了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完成了民国线装文献的整理和普查登记任务;我馆有10种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28种入选《河北省珍贵古籍名录》;举办的一系列古籍文献和民国文献展览等公共文化活动,使珍贵的古籍走进公众的视野,有效地传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5年,我馆被文化部授予“全国古籍保护工作先进单位”。

### 【精品举要】

#### 1. 周易传义大全二十四卷

(明)胡广(明)杨荣辑 明弘治四年(1491)罗氏竹坪书堂刻本 此书系明永乐间所修《五经大全》中的第一种,作者融合程颐、朱熹之学,兼取先儒诸家《易》注解而融贯为说。易序后有弘治四年(1491)罗氏竹坪书堂长形题记。总目末页题“弘治辛亥罗氏竹坪书堂新刊”。是书永乐之后翻刻多次,明弘治四年刻本只存十卷(卷一至七、十六至十七、二十四卷)、《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为国内仅存残佚。

#### 2. 戴氏集十二卷

(明)戴冠撰 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张鲁刻本 戴冠,明弘治、正德时期信阳作家群主要成员之一。是书尽收戴氏遗稿,前有张鲁嘉靖二十七年续刻戴氏集引,又戴氏诗集序,任良于嘉靖十八年(1539)书。卷末有戴氏子戴川跋,记述是书刊印经过。是书收录于《四库存目丛书》中。铃印有“宝翰堂藏书印”“慕斋鉴定”等未印。

#### 3. 河东先生集四十五卷 外集二卷 龙城集二卷 附录二卷 集传一卷

(唐)柳宗元撰 明嘉靖郭云鹏济美堂刻 本书为柳宗元作品集,收录其大量诗、文、论、寓言、游记、骚赋等,其中多有传世之作。字划、行款皆遵宋本,影刻极精,与万历徐时泰东雅堂覆廖本《昌黎集》俱为明嘉靖本之代表作,合称明版双壁。卷一书口下注有章甫言刊,章氏为嘉靖时苏州著名刻工。此书收录于《国家珍贵古籍名录》。铃印有“严长明用晦南图书记”“越山堂藏书印”“阳文方章,敦好堂印”“霍山裴氏”“裴氏家藏”等附

#### 文方章。

#### 4. 王氏家藏集六十五卷

(明)王廷相撰 明嘉靖、隆庆刻本 王廷相,明代哲学家和教育思想家、诗人,“前七子”之一。是书是由其本人编定的诗文集,于嘉靖之后广为流传,为世人所推重。铃“绛云楼藏书”章,曾为钱谦益插架之物。

#### 5. 何氏语林三十卷

(明)何良俊撰并注 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何氏清森阁刻本 何良俊,字元朗,号柘湖,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以博学多才闻名于时,自称与庄周、王维、白居易为友,题书房名曰“四友斋”。《何氏语林》常与《世说新语》并称,系继《世说》之后的代表著作,在“世说体”小说中占有重要位置。

#### 6. 史记一百三十卷

(汉)司马迁撰(刘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 张守节正义 明嘉靖四至六年(1525-1527)王廷詒刻本 卷前有司马贞索隐序,补史记序,张守节正义序,裴骃集解序。集解序末有“震泽王氏刻于恩袭四世之堂”长方印,目录末页顶“震泽王氏刻梓”六字,索引后序末有王廷詒跋百六字。清著名版本学家叶德辉称其“明人刻书之珍品”。铃印有“莫友芝图书印”“莫有芝”“曾在周叔瓠处”“于印省吾”等名章。

#### 7. 佩文斋咏物诗选四百八十六卷

(清)张玉书等辑 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内府刻本 是书为诗总集,佩文斋为清圣祖书斋名,故名。此书系康熙亲裁,申命诸臣汇集而成。所录上起古初,下迄明代,诗从物类,为地理人

事、虫鱼鸟兽草木之诗作。是书为内府刻本,收入四库全书部总集类,校刻精致,纸墨上佳,书为橙红绫原装,开化纸初印本。

#### 8. 《涅中赋》七卷附《家食稿》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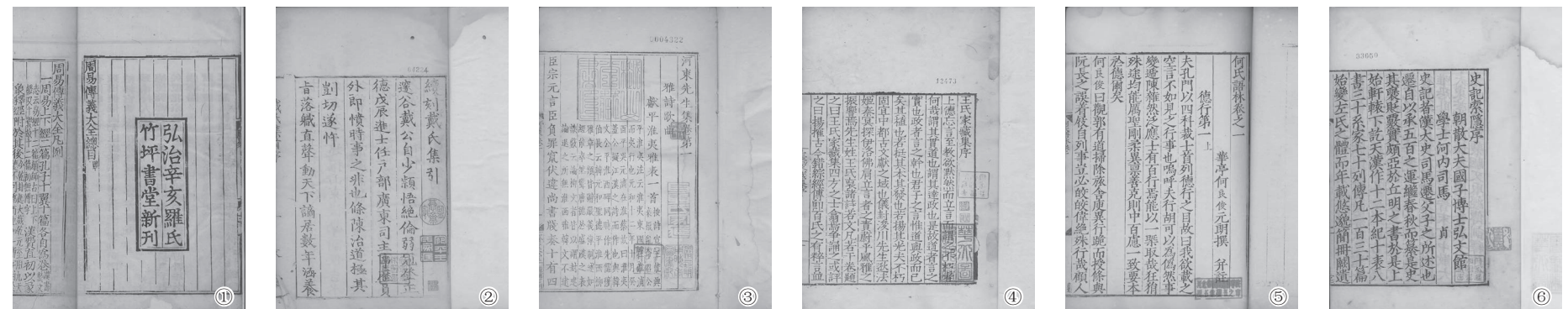
(明)万世德撰 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刻本 万世德,字伯修,山西偏头关人,明隆庆二年进士。前有万历甲午万氏自序,次目录。所收公私函牍,皆万世德平定西番,驻守遼中(今青海湟中县)之作。其中有删括番虏及获罪落职经过诸多史料。后附《家食稿》一卷,乃罢官居家之作,亦多遼中旧事委曲。《涅中赋》为其自刻书。明清时,遼中皆未修志,是书当以为重要的地方史料。

#### 9. 新刻三苏论策选粹八卷

(明)李时渐辑 明万历五年(1577)刻本 李时渐,字伯涛,号盘石,又号梦觉先生,明嘉靖三十五年进士,山东寿光人。卷前三苏选粹序,明万历五年(1577)滇西杨应东识。是书选辑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之“论”“策”两种,凡百篇。存世稀少,见收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 10. 刻曾西墅先生集十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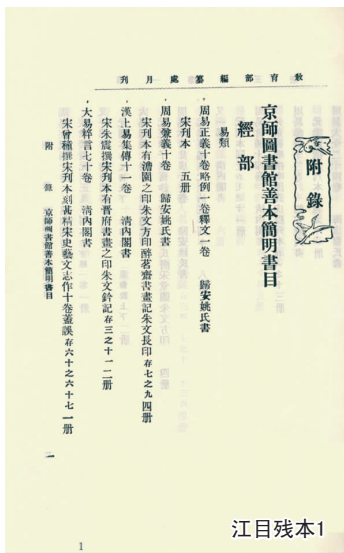
(明)曾棨撰 明万历十九年(1591)刻本 曾棨,字子崇,号西墅,永丰龙潭(今江西永丰)人。有“江西才子”之誉。明成祖永乐二年(1404)甲申科状元。与进士二十八人入文渊阁进学,明代选庶吉士之制自此起。后以副總裁,參修《永乐大典》《天下郡邑志》。四库别集存目二收《西墅集》十卷,亦为万历中永丰知县德清吴期昭选录本。此本为《四库存目丛书》底本。藏章有“苍岩山人书屋记”“家在清风明月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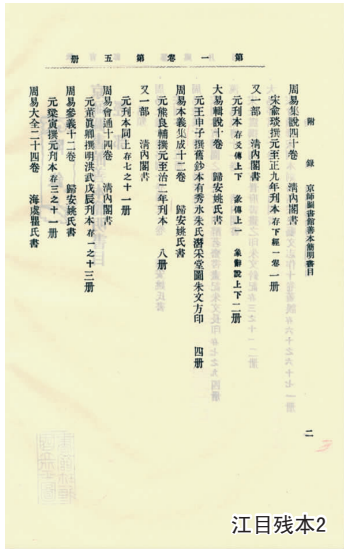
# 承先启后的江瀚《京师图书馆善本简明书目》

## 国家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简史(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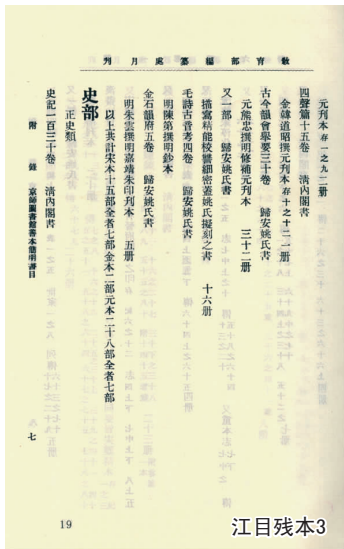
□徐蜀(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原总编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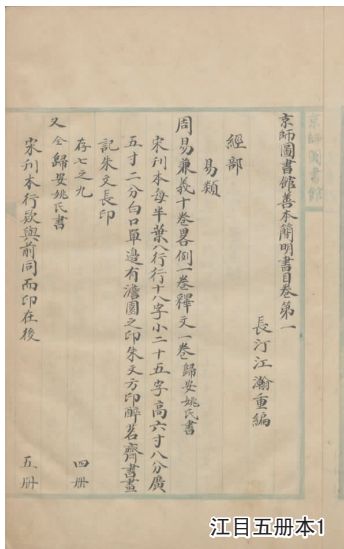
江目残本1



江目残本2



江目残本3



江目五册本1

江瀚(1853-1935),字叔海,福建长汀人。1904年赴日考察教育,回国后历任江苏高等学堂监督、学部总务司行走、学部参事官。1912年5月至1913年2月,任京师图书馆第二任馆长。1914年任北京政府政事堂礼治馆总编纂,1915年任参议院参政。1928年任京师大学代理校长,故宫博物院理事,后任理事长。一生致力于教育和文化事业。

江瀚任京师图书馆馆长期间,主持编纂了该馆第二部善本书目《京师图书馆善本简明书目》。需要指出的是,江瀚任内曾编纂过两部《京师图书馆善本简明书目》,先后上报给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其中一部经教育部批准,在《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一卷第五册至第十册连载,刊完经史二部后,《月刊》停刊,致使该目成了仅存经史二部的“残本”,余稿亦丢失。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藏有该经部史部《月刊》抽印本,子部、集部抄配了少量条目,以下简称江目残本(参见图1-3)。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还藏有一部京师图书馆绿丝栏抄本《京师图书馆善本简明目录》,五册,系民国七年(1918)京师图书馆目录课依教育部存档稿抄写而成,经史子集四部全,以下简称江目五册本(参见图4-6)。江目五册本与残本收书数量有差别(经部与史部),体例也不同:五册本删去了经部的解题和过录内容,保留了宋、元、金本的行款和版框尺寸;残本则进一步删除了所有行款和版框尺寸,篇幅更短。以往论者对五册本的存在多不知情,谈及江目时均以残本为例。

江目问世后的百余年间,学界对其评价普遍不高,如夏曾佑在提到京师图书馆前三部善本书目时,认为“三者之中,以繆本为最详”,“江本、王本(注:馆员王懋谔所编善本书目)盖即就繆本撮录而成,所不同者,仅增删书目十数种耳”(夏曾佑《详为呈送本馆善本书目恳请鉴定事案》)。1987年出版的《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前言所列此前国家图书馆的五部善本书目,干脆就没有江目。

其实,以往学界对江目的评价有失公允,江目的价值被严重低估。如夏氏谓江目与繆目“所不同者,仅增删书目十数种耳”,便与事实不符。经核查,江目残本经部收书130部,史部收书342部,比繆目经部和史部分别多出28部和44部;江目五册本经部和史部收书少于江目残本,其四部总数也比繆目多出近百部。另外,江目还改正了繆目中一些差错(后详)。既然江目收书数量比繆目多得多,夏氏赞繆目最详,指得只能是繆目对每种书著录得更详细,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那么,为什么他编目时不参照繆目,却全盘照搬江目的简略体例,甚至书名都一字不差地叫做《京师图书馆善本简明书目》(以下简称夏目)呢?至于《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前言对江目的不屑,亦有历史踪迹可循,早在一百年前京师图书馆时期,馆内同人便不认可江目残本。

五册本江目,书前有一篇京师图书馆目录课1918年撰写的题识,曰:“今年南宮赵次原先生来任馆事,注重历年筹备未完事宜,于善本尤加之意焉。见前年摆印之善本书目所引繆目、江目、王目等书,徧询馆员,未有知者。旋于《古学汇刊》中获见繆目印本,又于本馆文书室内得残本江目两册。均简单殊甚,不过大略椎轮而已。”文中所提赵次原即赵宪曾,字次原,直隶人,曾任直隶高等师范校长,时任京师图书馆主任,负责馆内日常工作。“摆印之善本书目”,指夏目;“文书室内得残本江目两册”,即前面提到的江目残本。

题识又云:“至教育部社会司查档,始知江前馆长瀚曾编善本书目两次,摆印本所据之江目,乃第一次所编者,无怪其多疏略也。乃以江氏第二次重编五册缮抄存库,以存永久而备考查云。”此段文字说清楚了江目五册本抄自教育部社会司档案室,但褒江目五册本而贬残本,并认为残本在先五册本在后,则大错而特错了。错在没有认清私家藏

目与图书馆公藏书目在本质上的区别;总以学术研究的角度,而不是从现代图书馆的功能和需求角度去评判书目的优劣(参见图7)。

现代图书馆书目最基本的功能是什么?一言以蔽之,就是“重典掌而便寻览”(夏目附《教育部指令第三十二号》)。“重典掌”是强调对书籍的保存与保护,系图书馆的内部管理职责;“便寻览”是指方便读者检索查阅,与图书馆的社会服务功能相关。又,1929年7月至1930年6月的《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记载:“前京师图书馆原有目录十余册,但编目方法均系旧式,且于陆续添购之书未能随时编入,颇不合用,实有从速改用卡片式目录之必要。”据此得知,最方便检索查阅的卡片式目录,京师图书馆时期未经启用,读者只能依靠书本式目录查找图书。繆目中不少条目的解题,动辄数百字;过录序跋的字数甚至多达一两千,如宋本《乐书》、桂未谷校笺《说文解字》、元刊本《辽史》等,于查找图书非但无用,徒增烦恼而已。对到任即面临开馆迎接读者的江瀚来说,第一要务便是改良繆目,剔除目录中无关“寻览”的内容。为此江瀚删去繆目的解题和过录文字,使篇幅缩减过半,故此书目的名称中出现了“简明”二字,这就是五册本江目。然而,上缴教育部待审后,不知是教育部还是江瀚本人,仍嫌书目不够简明、体例尚未统一,故再作精简,删除了宋、元、金本的行款和版框尺寸,这便是江目残本。

江目残本在后,系修订五册本而作的根据,除了图书馆公藏书目发展向简的趋势外,还有一个佐证:五册本继承了繆目一些著录差错,残本则予改正。例如《明史稿》《明史历志稿》,五册本与繆目均入正史类,残本改入别史类,夏目同;繆目、五册本《钦定日下旧闻考》均著录为稿本,残本改为抄本,夏目亦同。更重要的一条纠错是,繆目经部金刊本《尚书正义》,实为《尚书注疏》,误以书前那篇“尚书正义序”而错定书名(参见图8)。该书与汪士钟、瞿氏铁琴铜剑楼、陈清华郁斋、国家图书馆先后递藏的《尚书注疏》版本相同,后被赵万里先生更改为蒙古刻本(见《中国版刻图录》第269)。江目五册本亦错为《尚书正义》,残本则改正为《尚书注疏》。不可思议的是,成书晚江目3年的夏目,却延续繆目之误,仍著录该书为《尚书正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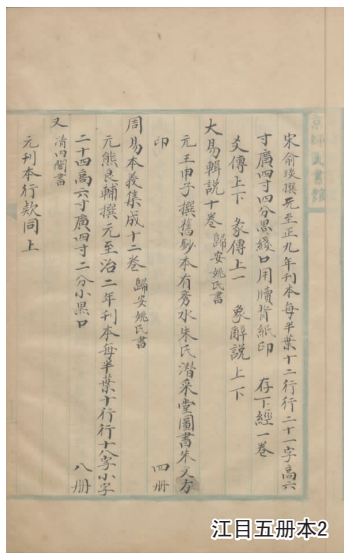
目录课题识云“乃以江氏第二次重编五册缮抄存库”,或受五册本每卷卷首所题“长汀江瀚重编”的引导。殊不知,“重编”乃指重编繆目,并非江目残本。江目残本连载于《教育部编纂处月刊》之附录,从头至尾未著编者名氏;原稿若存,也应有“长汀江瀚重编”字样。

综上,江瀚删除繆目的解题、过录内容,统一编例,首创善本书目“简明”体例,彻底切断了私家藏目向图书馆公藏书目过渡的羁绊,眼光独到。此后不仅夏目依例编制善本简明书目,1933年赵万里先生编纂《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虽无“简明”二字,却因体例一致而有简明之实。傅增湘先生在该目序言中说,(赵万里)“今乃拟定体例,将欲辑为书影,录为书志,次第刊布,以便编摩,先成简目四卷,授之梓人”。证明赵目亦为简明书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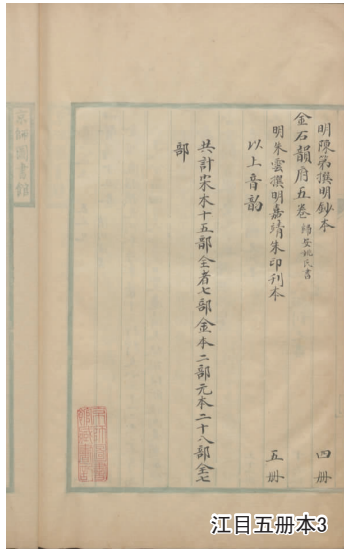
除此之外,江目还首次在图书馆公藏书目中加注书的来源,如“清内阁书”“归安姚氏书”“南陵徐氏书”“海虞瞿氏书”等,在京师图书馆草创、馆藏急剧增长阶段的这一举措,意义重大。夏目萧规曹随,及至1959年,古籍集中归于公藏后刊行的《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再袭此例,于每部书后详注捐书人姓氏,为厘清国图众多古籍善本的递藏关系,奠定了基础。

如果说繆荃孙的《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是私家藏目向图书馆公藏书目过渡的产物;江瀚的《京师图书馆善本简明书目》,则标志着现代图书馆古籍书目编纂体例的建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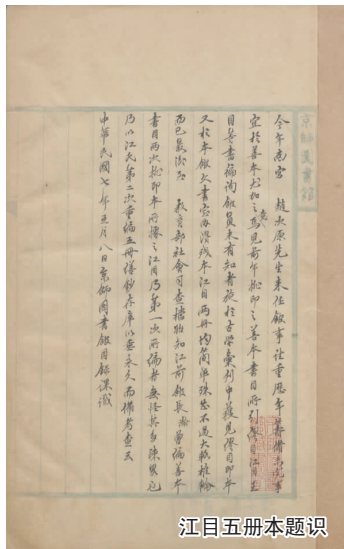
江目承先启后之功,当被永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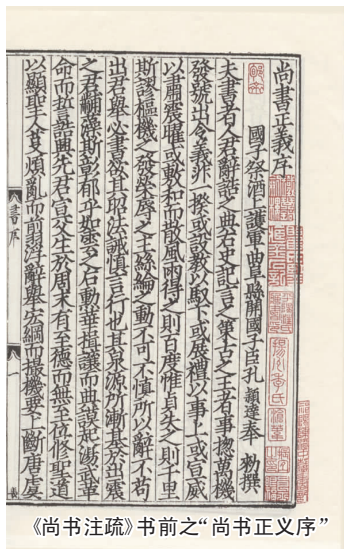
江目五册本2



江目五册本3



江目五册本题识



《尚书注疏》书前之“尚书正义序”